

瓦房店文史資料

一九八五年

第 二 期

(总第二期)

瓦房店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

十二月一日出版

目 录

伪满的奴化教育.....	王连维	牛正江 (1)
张逸秋与萤光社.....		王连维 (7)

伪满的奴化教育

王连维 牛正江

一九三一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“九、一八”事变后，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，使我东三省沦为殖民地，成立了伪满洲国，并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拉出来做了傀儡皇帝。日寇妄想让我东北三千万同胞，永久做他的奴隶，在学校里强行奴化教育，摧残毒害青少年。笔者伪满时在中小学里读书，出校后在复县小学任教，对日寇强行的奴化教育，深受其害。兹将日寇的罪恶活动，简述如下：

一 建立统治机构

伪满洲国建成后，伪复县公署立即组成，并设立教育科。科内设教育股和礼教股，管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。还设视学一人，负责视察全县师生的思想情况以及教学和学习情况。一九四〇年前后，在视学以下，又设四名视学委员，分片监察区内各校师生的活动情况，实际是帮助视学推行奴化教育的帮手。学校师生，对视学和视学委员，畏之如虎。在视学未来之前，就得做好各种准备，免遭不幸。视学到校时，师生们还得鼓号齐鸣，列队出迎于村外。到校后，除盛宴接待外，还得满足其嗜好，如吸鸦片的送入烟馆，离校时还得赠送礼品，一切费用，都由教师薪金支出。视学满意，既不听课又不查问，回去就在《复县教育》上大肆表扬，同时校长和教师还能得到提拔和长薪的待迁。如接待不周，则百般挑剔，处处刁难，轻者在《复县教育》上申斥、污蔑，重则降职降薪开除公职。

伪教育科建成后，就派来日本人做付科长，名为付职，实掌教育大权，一切事务必须经他许可才能执行。一九四〇年后，日寇从国内调来一批伤兵和预备役军人，分派到瓦房店、复州城、复州

湾、松树等地国民优级学校里去任教师或付校长，名为教学实际是派到学校来监视师生生活的特务。师生经常遭受他的污辱和打骂，一时不慎就有生命的危险。

二 禁书焚书

伪教育科建成后，立即命令学校，销毁中国出版的各种教科书，不准阅读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书籍，凡有孙中山、“中华”、“民国”等字样的书籍都得烧掉。就是教师使用的《辞源》、《康熙字典》、《学生字典》等工具书中，如有上述字样的也得涂掉；庙里的石碑和墓碑以及商店挂的牌匾，有上述字样的也得凿掉。除视学到校检查外，伪满警察还经常窜到学校搜查，如发现师生阅读或保存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书籍，就以反满抗日论处。学校师生，在敌人的法西斯统治下并未屈服，将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各种文学书籍，都周密地隐藏起来，等待祖国的光复。

三 妄想消灭中国人的祖国观念

禁书以后，日寇强令学校，在教员室和教室里，悬挂伪满皇帝的所谓“御影”（照片）；还要在校内外和教室里的墙壁上，张贴“日满亲善”、“日满协和”等反动标语，教室还要悬挂日本和伪满国旗。不准师生说自己是中国人，都得说是满洲国人。视学进校，提问学生的第一句话，就是“你是那国人？”如回答是中国人，不但立即遭受毒打，而且还要把师生定为反满抗日分子，遭到更残酷的迫害。

一九三九年，在中等学校里，又增加了《国民道德》一门课程，后来改为《建国精神》，专门向学生灌输如何做好日本帝国主义忠实奴隶的反动内容。历史课学的是满洲史，只字不提中国，就是中国地图也见不到，偶尔提到一点，都是歪屈历史事实。在学习《世界史》时，主要是灌输日本的侵略史，妄想使学生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。

每日朝会，都得升伪国旗，唱汉奸郑孝胥编写的伪国歌。先向日寇东京遥拜，次向伪新京(长春)遥拜，并做日寇编出的所谓“建国体操”。一九三五年，溥仪到日本东京去，朝拜他的主子日本天皇裕仁回来后，发出所谓的《回銮训民诏书》，其内容主要是宣传日满亲善，让中国人永远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。各校都发给一份，装在二尺长，四寸高的木匣里，外边包着黄布，强令学校，把它搁在校长室的最高处。后来又要求学校建立“奉戴室”供奉诏书。如有丢失或损坏，学校负责人就有生命的危险。如一九三六年，恢复县城山村夹河心小学，因失火烧掉“诏书”，该校负责人何庆臣，就被伪警察逮捕，并送到大石桥日本宪兵队加以惨害。学校有了这个不祥之物以后，每逢三月一日，所谓的满洲国“建国节”，学校都得召开庆祝会，校长都得向学生宣读诏书，会场里不准出现任何声音，如站的姿势不正，或发出咳嗽声，就要遭到日本教师的毒打。后来迁到日寇的“天长节”(天皇生日)、“地久节”(皇后生日)等节日，学校也得开会宣读“诏书”。一九四一年傀儡皇帝又发出《时局诏书》，一九四二年又发出《国民训》，强迫师生，每天朝会时，都要以日语背诵《时局诏书》和《国民训》。如背不出，就要遭到打骂。

四 实行奴化教育制度

一九三二年后，日寇为了便于统治和奴化中国人民，将昔日各自然屯的私塾合并，改名叫国民学校(初小)，每个伪村公所里，成立一个国民优级学校(高小)。每个学校相距较远，使很多儿童因为路远上学不便而失学。一九三七年，日寇又实行了所谓的新学制，小学部分，仍用“四、二制”将初中和高中合并，改称国民高等学校，学习年限，由原来的六年减为四年，大学一律改为三年。总计比日本国内学校，整整地减少了五年学习时间，严重地降低了学生的文化水平。各县的国民高等学校多为农科

或商科。伪满时，在复州城国民优级学校附设补习科（等于初中）在瓦房店有男女两个国民高等学校。一九四〇年，又成立一所师道学校（师范）。男子国民高等学校学习农科，每周课程表里，塞满了劳作课（劳动）；女子国民高等学校，学的是缝纫和烹饪等课程。一九三九年，在中等学校里，先后实行军事训练，派日本人和伪军做教官，每周的课程表里又塞进军事训练课，有时不分昼夜和授课时间，教官突然下令搞行军，学生集合等行动稍慢，就要遭到毒打。吃饭时间也按军事行动要求，不得超过十五分。因吃饭时间不足用，使很多学生患了胃病。实行军事训练后，中等学校学生都戴上战斗帽，整天得扎着裹腿，后来小学生也整天地扎上裹腿。这时，学生们不但得不到很好地学习，而且身体健康，还遭受了严重地摧残。

五 破坏语言和文学

日寇禁书焚书后，教科书大部换成日本人编写的课本，将过去的汉语改叫满语，为了达到奴化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，他们不按儿童年龄特征去编写教材。一年级学生，学习的第一课书，就是“皇帝陛下”四个字，日寇妄想从启蒙教育开始，就向儿童灌输忠于伪满皇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。其它年级的教课书里也都塞满了“乃木大将”、“天照大神”、“日满亲善”等反动内容。教科书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编的，写了很多语法不通的句子，凡是人名、地名、技术专用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，同时在书中还夹杂了许多汉语和日语混杂的所谓“协和语”，严重地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。在教满语的同时还要教日语。一九三八年后，日寇又把满语改称国语，其中分满语和日语，其目的就是要逐渐取消满语，以日语做为国语，最后消灭中国人民的语言。强迫教师不但上日语课时要说日语，就是上其它课程时也要说日语。上体育课和集会时，一律使用日语口令。师生之间，同学之间，互相问好时，全用日语会话。伪满初期，日寇为让学生学好日语为其奴役，每年都举行两次日语翻译考试，考取特

等和一、二、三等翻译资格的，除每月按等发给补助全外，毕业后还能得到优先录用的待迁。但是有民族气节的学生，都不受敌人的引诱。

六 挑拨离间 破坏团结

日寇很怕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。因此，在学校里强行“等级教育”，教师可以任意体罚学生，高年级的学生，可以随便体罚低年级的学生。如低年级的学生，在街上遇见比他高一年级的同学，就得列于道旁行举手礼，如有疏忽，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对他进行体罚，就是被打得鼻青眼肿，甚至流血负伤，也不准进行反抗。如向学校报告，还要受到严重地处分。笔者伪满在海城师道学校读书时，有个姓张的同学，课后和同学们正在清扫教室，班主任和久井（日本人）突然闯进教室，不谈什么原因，抓住他的脖领就拳打脚踢，并几次将他摔倒在地，磕的头破血流，还得立即站起行礼，嘴喊“哈伊”，直到日寇的淫威发泄完了，才停止体罚。敌人残害学生的手段是多样的，有时找到一个学生的所谓错误，就罚全班学生下跪，挨个打嘴巴子。有时让全班同学相对而立，互相打嘴巴子，如不打或不重打，就要遭到日本教师的更加残酷地打骂。

日寇还挑拨学生与外校的学生互相殴斗，笔者在瓦房店就见到，瓦房店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与大连商业讲习所的学生打架。当时有的学生到街上去，都不敢戴有校徽的帽子。日寇把这种罪恶行径，美其名曰“精神训练”，实际是摧残学生身体健康，破坏师生和学生之间的团结，以达到他分而治之的罪恶目的。

一九四三年后，日寇在太平洋周围的侵略战争，节节败退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更加畏惧，对教育界的迫害更加凶残。在伪省、市、县里，普遍设立思想矫正局，命令学校师生，每人在左胸前都要戴上白布条。教师在布条上，要写出校名职衔和姓名；学生在布条上，要写出姓名级别和校名，以便日寇随时逮捕和惨害。当

时师生虽在恐怖之中生活，并未屈服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心更加坚强。各校师生，都采取了各种手段与敌人进行斗争，直至祖国光复。

张逸秋与萤光社

王 连 维

张逸秋老师，是辽中县莲花泡人，曾肄业于北京铁路大学。

“九、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参加了反帝同盟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，并参加了“一二、九”学生运动。一九三四年，组织派他回东北撒布抗日种子。历任辽中、海龙县国民高等学校教师。一九四二年，转到瓦房店国民高等学校（今三中校址）做数理教师。到校后，他当着学生的面，经常骂小日本。他指着积极为日寇效劳的人，非常气愤地对学生说：“你看这些混蛋，为谁干的，干些什么都不知道！”这种正义声音，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，因此，同学们都愿意接近他。他常向学生传播反帝爱国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，如教育学生说：“做一个人应当有气节，绝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”。同时还向学生讲，他参加“一二、九”学生运动的斗争情况以及“一二、九”学生运动后，学生代表到南京去请愿，蒋介石不但不答覆代表们的正义要求，反而派出宪兵和三青团的特务，把代表们看管起来，强迫他们去当兵。代表们不为蒋介石去卖命，就遭到了百般的折磨。有的病饿而死；有的被迫投江自杀；也有的在渡江逃走时落水身亡的史实给学生听，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，反而惨害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。张逸秋老师，除在课后向学生进行教育外，有时他不怕日本教师的迫害，站在课堂上就向学生们讲：资本家和大财阀的资本来源于剥削工人的革命道理。感情激动时，他还唱起革命歌曲给学生听，把《政治经济学大纲》、《社会科学讲话》、《货币与资本》等革命书籍借给进步学生看。当时徐功玉、马长恩、张俊治、张俊喜等学生，在张逸秋老师的启发教育下，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、鼓起反帝的决心和斗志。这时，他

们又看到盖平县国民高等学校和海城小学部分进步师生，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艺稿件，徐功玉除向撰稿人通讯联系外，他还亲自到海城去拜访曲洪涛老师，到盖平县国民高等学校去与臧永昌、邹健等同学会面，在访问中，互相交谈了爱国抗日思想，曲洪涛老师还把他隐藏在坟墓里的革命书籍拿给他看。徐功玉等六名进步同学，在张逸秋老师的启发教育以及在海、盖师生的影响下，他们就在学校里组建起萤光社，通过他们的亲友关系，先后发展了四十三名社员（也叫会员），并办起《萤光》刊物，名义上是个研究文艺组织，实际是通过文艺作品来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，让群众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一点光明。徐功玉负责总编，马长恩负责编辑小说，张俊喜负责散文，张寅治负责新诗，当时同学称他们为四大编辑。每月出刊一期，油印十六开本，二十余页，印百余份。出刊年月使用公历，不用伪满康德的年号。为了迷惑敌人，他们还请班主任写首诗，登在第一期封面上。第一期封面插图是马长恩画的，第二期封面插图是奚乃宽画的。《萤光》刊物，除发给社员和校内外进步同学外，还寄给海、盖学校的进步老师和同学。当时发表的主要作品有：徐功玉写的《悼瑞弟》，揭露日寇侵华后，抓劳工，征国兵，造成瑞弟家破人亡的罪行。张寅治写的新诗《萤光赞》，说明萤是黑夜里的一点光明。马长恩写的寓言故事《萤与蝇》，说明萤火虫在屁股后面发光，它引导后进者一道前进。《萤光》先后出了两期，在校内外引起很大反响。盖平一高和二高、瓦房店女子国高、复州城国民优级学校的一些进步学生，纷纷寄来稿件。正在准备出刊一期外来稿件时，萤光社的社员赵泮林的哥哥在大连因事被捕，株连了他，日本宪兵搜查赵泮林的宿舍时，发现了《萤光》刊物，将它送到伪复县公署警务科进行追查。当时校长是日本人增勇，立即追问徐功玉等四个编辑。在这紧急时刻，他们不知

应当如何对敌敌人，就去请教张逸秋老师。张老师指导他们对抗敌人的办法，并表扬了他们的爱国行动。学生们在危急时刻，得到张老师的支持和鼓励，个个精神振奋，斗志昂扬，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。据说伪警察把《萤光》刊物翻成日文，交给日本人审查。经过半年时间、没有任何消息，《萤光》也因此而停刊了。与海城、盖平两县学校师生的联系也中断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两个县的爱国师生都被敌人逮捕入狱了。

萤光社和《萤光》刊物，从成立到停止活动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在鼓舞复县师生热爱祖国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，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此事至今在教育界里还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一九四五年祖国光复后，张逸秋老师就参加了革命队伍，先后担任金县人民政府秘书长、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，最后在旅顺博物馆工作，一九五二年因病逝世。